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效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大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
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2〕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
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
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
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3〕诸先生不要学徐
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
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
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
〔4〕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
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
人，“先安内而后攘外”〔5〕，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
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
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
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
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
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
·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
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
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
有用了，我可自己

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其次，我对
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
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
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
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

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
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
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
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
“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
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

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
指挥罢。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
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
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
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
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
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
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
“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
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
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

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
加入的限制与条件〔7〕。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

·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
·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
妹，·之·乎·者·也，·或·驾·鸯·蝴·蝶

{ 8 }

·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人民阵线〔9〕，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
·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预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10〕。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
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
·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
·方·面·来·参·加·抗·
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是“汉

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
·防·文·学”·与

“·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
·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邨人〔11〕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1“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
·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
·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
·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15〕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16〕，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17〕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
·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
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

及·纠·正·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18）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像辛人（19）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我更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20），译过几章《死魂灵》（21）病，签过一个名（22），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23）或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25）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向以后的穆木天（26）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学》（27）发表了O V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笔录也和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28）向傅东华抗议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的办法（29）。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

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30）。同时，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明明是有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31）之称，但他并没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32）。黄源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安那其”的破坏革命（33），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34）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也没有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35）和“文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36）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手段，移到文坛上。噤噤噤噤，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噤噤噤噤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

的道路。不过也已经糊涂得可观。（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大林传》〔37〕。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六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2〕徐懋庸参看本卷第293页注〔1〕。〔3〕巴金原名李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4〕“文艺家协会”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

〔5〕“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6〕《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7〕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8〕鸳鸯蝴蝶参看本卷第419页注〔9〕。〔9〕法国的人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正式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证。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百七十八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10〕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义的方法。”

〔11〕杜衡参看本卷第4页注〔4〕。杨邨人，参看本卷第1〔9〕；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主张相呼应。

〔12〕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活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主义作伴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一定要句句救亡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13〕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六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